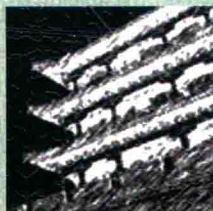


■ 崔荣◎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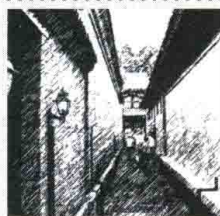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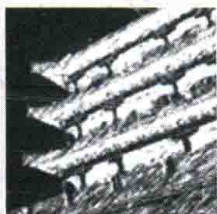


作家叙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崔荣◎著 ■

京



派

作家叙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派作家叙事研究 / 崔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161 - 8472 - 1

I. ①京… II. ①崔…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北京市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1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敏珠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京派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叙事上的自觉与革新。他们身处“非文学”的时代却对构成文本“文学性”的相关诗学因素极为看重并勇于实践，由此文学现代化的命题在京派作家那里有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进。京派作家文学叙事、小说形态研究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具体、科学地说明京派创作价值，精准把握京派作家创作特质。京派作家的创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支柱和重要构成力量，他们文学叙事中显示出的叙事路径的选择及背后对于多重文学和文化的兼容并蓄与创造性转化意义深远。对京派作家的叙事研究构成本文的中心立场和贯穿线索，而这个过程，也是追索京派文学性“如何”形成的诗学之旅。

对于20世纪30年代趋于成熟，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文学特质，也刻意于小说艺术的京派来说，传统文学和文化以及构成其本质的文学传统等应该是京派作家小说叙事的重要研究背景和研究的基本视域。探寻京派文学叙事如何形成其文学性，首先应该对京派作家的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学作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即，应当从题材内容、结构方式和审美风格及与其对应的，作为稳定性深层的审美意识、情志表现方式、艺术思维方式等入手，对京派小说家创作时明显表现出的、对于某一文学传统的偏好，与这种文学传统作细致的比较分析，并由这种比较分析，揭示京派小说之中的古典嗣响所具有的，超出个人的、流派的文学史意义。

科学研究采用的方法和切入的角度，应该适应研究对象。从上述研究角度切入，完全基于一种文学事实，即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不论是在外在形态上还是内在理路上，都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历史

联系。并且，不管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创作实际中，比之同一时期的其他现代作家，京派都是深刻地意识到传统文学具有绵延性和再生性可能的知识者。譬如，对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而放弃旧有的一切的现象，凌叔华当时就“有点怀疑”^①。废名则明确宣称，“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在他看来，这种“生长”明显地表现在好友梁遇春的散文中，废名认定其作是“我们新文学中的六朝文章”。^② 沈从文意识到“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因而倡导作家重视传统的阅读习惯，以创作影响和引导国民，用“‘小说’来代替‘经典’”。^③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待文学历史的绵延性，这也未尝不是他在现代中国叙写传奇的重要原因。他还具体指导作家，创作“同时多少皆得保守到一点传统形式，才有一种给人领会的便利。文学革命意义，并非是‘全部推翻’，大半是‘去陈就新’”^④。他认为作家应该从“广泛的旧的传统最好艺术品中，来学习取得那个创造的心”^⑤，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沈从文和废名是一致的。朱光潜将上述观点表述得更为周严：“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是生命不息，前浪推后浪，前因后果，后一代尽管反抗前代，却仍是前一代的子孙。”^⑥——这完

① 凌叔华：《古韵》，傅光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废名：《三竿两竿》，《废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26页；《〈泪与笑〉序》，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初恋》，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③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5、127页。

④ 沈从文：《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⑤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5、127页。

⑥ 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杂志》1948年1月，第2卷第8期。

全可以视为京派作家对历史传统与当下发展的文学之间的关系体认的理论概括。而我们之所以重视、并特别指出这些相像或一致的识见，不仅是因为它们明确反映出京派对传统文学的认同心理，更因为，京派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思考之中，显然有或阐释、或创作的现实需要，是他们要向传统文学取得艺术借鉴的强烈愿望的体现。更何况，这些认知还已经以审美选择的形式，渗透融化在其大量的小说创造中。

本书从诗学层面切入的基本研究思路，加之京派作家在自身精神结构和文学创作中反映出的深刻的传统影响的文学实际决定了更具体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文学传统和作家精神结构这两个方面，寻找其共通点和精神血缘关系。再将其作为一个立场和出发点，把作家的精神创造置于整个文学历史、社会历史的“关系”中，进一步在文本中探究影响、寻绎渗透，研究作家对传统文学的接受、转化和超越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意味深长的得失成败。

这个过程甚至会比将要得到的结论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出于通常的一般考虑，即，对文学研究而言，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细致的论证；而且也是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既对作家创作做追根溯源式的历史考察，又要观其走向流变，试图在对作家创作演变轨迹的动态把握中，呈现剥露作家的创作特质，也考察传统与创新之间并不简单的关系。

追根溯源更关注的是传承，是对京派作家知识、文学谱系构成的追问。追问关注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京派作家对某种文学传统的选择和接受表现在哪里，放弃和超越的又是哪些部分？对“接受”的分析比较，是为了考辨出文学传统怎样具体地支配和影响京派创作的审美意识和情志表现方式，也能观察到文学传统在变动不居的现实语境中所获得的新的意义内涵；他们放弃和超越的东西又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思考，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学传统的选择和涵化，有何规律？

与追根溯源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描述作家创作的走向流变。本书更关注的，不是线性的、井然有序的作家创作阶段划分，而是历史的

多向并行性在作家创作实践中与作家文化人格上的反映。即，本书努力呈现同一个作家可能同时具有的几套笔墨；一颗心灵同时容纳的两种或多种为人为文态度；为了更精彩地阐发某一文学主题，作家可能进行的多方面的实验、习作与努力。譬如，比照魏晋人文风貌，本书发掘出废名小说中的非严肃精神，这就在学界定位废名时更常见的，诗笔写田园的结论之外，增添了认识废名的层面；而在“传奇”的烛照下，沈从文从“传奇之奇”到“反传奇”的“传奇不奇”的写作，也就显露出他反复强调的“习作”的全部苦心和他进行小说文体实验的意义。

不管是追根溯源还是观其流变，作家创作原生态的丰富性与多向性，是笔者试图恢复的；他们为扩大小说“版图”和疆界所付出的所有诗学上的奔突、冲决和努力，也是本书着力确认、肯定的。

当然，在多样性中，本书也注意寻绎一致性。力求以同样辩证的态度，分析作家创作中“常”与“变”的辩证统一。

一般而言，作家通过作品表现的人生内容中，往往凝结着他独特的生命体验；而如何表现他所关注的人生内容，又会反映出作家的审美趋向。对作家个体而言，这两者是不易摆脱的，会长时间地影响和支配其创作，形成带有个人标识的感知方式、取材范围与审美趣味，从而造就作家创作的风格特征。京派作家也不例外。同时，作为创造性转化文学传统的主体，京派作家自身会在与传统和现实包括外来（西方）影响的碰撞中，形成较为稳定的主体性。惟其如此，才能谈得上转化而非同化。因此，总会有某种深层的、规定作家创作变化的“语法规则”的存在。正是这条主线的存在，使其创作万变不离其宗，保持着个人风格的稳定性。

本书也试图在大量文本中，找到伴随每一位京派作家创作始终的贯通线索。比如，论文主体就详细论证出，对历史转折时期各种女性（这包括太太、姨太太、老太太、旧闺秀、新女性等）压抑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就是凌叔华创作的总主题；而绘画式的“流观”视角和价值并置的小说结构，则是她小说的一般形态。废名由人的发现而发现自然和社会，又由之重新思索和定位人的生存，这是他形式不断翻

新的小说创作不变的主题；而“断片”式的小说结构，非严肃精神和跳脱滑翔着的联想和想象，则是他艰苦探索生命意义时常用的诗学手段。为“传”生命之奇，沈从文凭借传奇的诗笔，虚构奇境异域也想象现实（不管是他笔下的湘西还是都市，都是他个人视野中的“现实”，未必会与实际情况相符，故言其是对现实的想象，但这想象却并非因此而不具有真实性。并且想象现实也绝对是一种能力，它甚至比虚构式的想象更难，要同时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而不流于平铺直叙），由此描绘湘西生命图景，剥露城市生命形式的荒谬，张扬生命的“神性”，表达他对处于变动的时世中的人性和生命不变的深层关怀。而以人文主义的情怀笔记人间，也像一根红线，使汪曾祺拢万物于笔端，沉静从容；常能以平和散淡的结构形态，流露对生活深刻的热爱与怀恋。——把握作家的创作实践、思想观念的内在延续性以及在这种延续性之下，文学表现的变与不变，是本书的中心。

故而，这个“探究影响、寻绎渗透”的过程，必然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向度或研究内容。

就作家自身说，是既对作家创作取整体观，又通过比较其创作的调整与变动，观察作家创作在不同时期下的复杂变更。同时，还要以创作主体为中心，建立坐标系：在以文学传统、文学史为视镜的纵向历史考察，以及与同时代其他流派作家、主要还是京派作家群体内部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定位和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唯有观望与对照，才能对比出真正的特质。因此不论在哪个向度，都既要求有文学的整体意识，也须具备文学的比较意识。在对传统和现实均能“继往开来”的京派作家进行整体比较研究的同时研究其个体的独特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精神，都尤其必要。

分析作家身处的具体的现实历史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和“渗透”，是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因为对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的个人命运、创作命运与时代、民族的命运有着格外密切的关系。本书也注意考察作家选择的文体、语言形式以及内在于其中的意识形态信息与时代和时代总体的叙述方式的关联，关注制约他们选择和转化的历史

要求和审美要求。比如,本书认为,沈从文传都市之奇,未必就是为了缓释都市压力和个体自卑心理;而是因为直觉到,都市中人的生存现实是,湘西式的神性存在方式被当作娱乐意义上的“传奇”,现代化的价值尚未完整、全面地进入人们的信仰和伦理体系,而他们还不自知如此下去的严重后果。这导致了作家的焦灼与恐慌。刻意有别于当时构成文学主潮的进行曲,无论是《边城》式的忧伤挽歌还是《八骏图》式的尖利哀鸣,都是他为20世纪30年代谱写的招魂曲。沈从文关注着这个时代和时代中人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初选择“笔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也是他在批评视野、读者期待、历史趋势和文艺现状等多重关系中找到的,最为恰切的介入时代的诗学方式。尽管保持了一定的审美距离,在京派作家远离时代的表象轮廓下,同样包含着投入这个时代的勇气和决心,与时代保持着深切的关联。笔者也就试图通过对他们文体选择的详细分析,以个案研究带出对文学史的普遍研究,又在凸显个性中深掘其文学、文化和历史内涵,把握作家作品与历史和时代的复杂关系。

通常,被反复提出的问题,一是因其重要;二是因为这个问题本来需要解决的任务、应该达到的目的,可能还没有完成。重提京派作家与传统文学的“老问题”,出于笔者对京派研究现状的一些反思,针对的也是京派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

目前研究京派,学界常见的是,文化批评、流派批评和作家个体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京派研究,已经开展二十余年。京派,连同其领袖人物沈从文等的重新浮出文学史地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化批评的兴起。较之之前常用的较为单一、传统的批评方法,无论是在方法层面还是价值层面,文化阐释都显示着一种超越。因为它显然是一种更宽泛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有着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开展批评时,则相当强调以理性的批判精神质疑和重新面对此前已成定论的某些文学现象。这决定了,在这种批评体系下,将京派置于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背景中审视时,研究者可以不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且可以从哲学的、历史的、民俗的、心理的、道德的等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

多方位地重新发现京派的价值和优长。京派的思想价值、文化底蕴也因此而被凸显。这其中，思想价值的评判和文化——心理角度的谛视，是前辈研究者所注重的，也是取得了扎实成果的。但宏大的文化批评在突破之前研究文学时常用的政治学、阶级论，将研究对象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地带和系统后，却似乎仍然在文本之外游离；作家作品，有时也成为证明某种结论成立的注脚。这说明，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文化批评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现、凸显某些东西时，也会有所遮蔽，同样有其鞭长莫及处。但是，如若被遮蔽和无法进入的，是文学批评必须去关注和探究的文本的诗学构成，就应该在后来者的研究中，有所反拨。

即使不论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局限处，这里也有更具体、更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学界证明了京派重造民族品德的主题意蕴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时汇入的同样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这一结论后，研究者很快就能发现这样一个尴尬，京派的文学特质，似乎还未得到透彻的说明。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在确认京派关注国民性、关注生命和人性的文学主题后，还必须追问，京派作家（不仅作为流派整体，还有个体）是以怎样的角度和方式，切入并表达这一主题的？因为显然，不同派别、作家之间，可以有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思想倾向，研究者甚至也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权宜地以之“证明”他们之间的平等地位，但切入时，创作主体所采用的结构方式、叙事技巧和运思方式，即审美趋向和诗学手段构成，却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艺术创造的个性、特质和能力才能显现出来。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再对这种个性和特质进行全方位的说明，接近研究客体历史实际的可能，才更进了一步。而具体到京派作家，他们又是如此强调近乎“独断”的个性！因此，研究京派时，就更应该强调宏观的文化批评和微观的艺术批评相结合。本书关注文本的诗学构成，也是对以往京派研究中文化阐释的不足的某种补充。

另外，本书也试图去克服在将京派作为流派展开研究时，可能出现的某些矛盾性和局限性。流派特征所标示的，是一群而非单个作家

的特点，抓住流派，是为了切近作家背后更具共性、更为本质的东西。理想的研究状态应该是，达到流派共性和作家个性的辩证统一。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悖反是，当流派研究重视普遍性，并由之概括、解释创作现象时，艺术创造最重要；谈艺术创造时，最需要强调的就是个性。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矛盾：文学本身，天然就是个人性的、感性的创造活动；那么，要概括和归纳共性，就有可能掩盖个性的光芒，即使共性出之于个性。对于标榜个性的京派而言，这个矛盾会显得格外突出，因为甚至可以说，强调个性、组织松散，就是可以作为共性进行总结的，京派的文学特质之一。在此意义上，创作各有千秋的京派作家们，他们的流派特征是较难归纳的。

而且，流派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在题材内容、审美型范上将京派与其他流派区别开来后，还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流派后”问题，接下来呢？研究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还应该以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继续：在通过个性寻找到共性后，还要在“相似”中，用更为精细的目光搜索“相异”，以“同中见异”的方式，在更高的层面、更深的程度上，区分流派内部不同作家的创作面貌。

上述矛盾性和局限性，在当下的京派研究中，不是没有。针对这些困境，又与京派长于从传统文学当中寻找（这种寻找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接通）契合自己的文学资源的历史事实相适应，本书认为，用归纳的方法研究京派，不如用探源的方法。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流派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有的有群像而个体面目模糊，有共性而少个性的局限；另一方面，文学传统能够延续多年，主要就是因其在思想意蕴、诗学方式包括艺术运思方式上相对成熟、固定，而这种稳定性特征在其千年的不断流变也在不断沉淀中，这往往已经成为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共识，即使不能进行精确的理性描述，也可进行模糊却又分明存在的感性把握。厘清京派作家的渊源流变，在很大意义上就能较明晰地区分、描述其文学特点。当然，在更大范围内，这种区分和个性，回归的又是京派作为一个流派最突出的共性：明显地表现出传统文学气息和民族气派。

研究京派最常见、成果也颇丰的，还有作家个体研究。但研究中

有意无意的“偏至”还是影响了对作家全面的认识。这种“偏至”主要表现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是某一作家某一时段或某一侧面的创作，当这些研究形成突破后，众多随后跟进的同一方向大量研究凸显了这个作家的某一特征，这种人为的学术“聚光”使“某一”成为“唯一”，造成对作家认识的以偏概全。特定的文学语境和历史时期，在研究中出现“深刻的片面”也许不可避免，但对作家“全人”、创作“全篇”来说，却不公平。比如，废名大量创作的讽刺谐谑小说（废名自己也意识到，“《张先生和张太太》这类东西”艺术寿命并不长，但有时“他更爱惜这短命的产儿”^①），还有汪曾祺的梨园题材小说和《聊斋新义》等后期创作，在研究中就未得到充分重视。本书在呈现作家原生态的丰富性的同时，上述弊端，得到了部分的克服。

汪曾祺曾表示，不想让别人像对待切段的鱼一样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分段研究，正是诙谐深刻却也无奈地指出目前作家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歧途；沈从文在面对自己被扣压、遗失后留下的著作遗憾地说：“遗失的稿子偏偏是写社会疾苦方面的那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就更不了解我了！”^②其实，文学研究对作家某些创作的遮蔽，未尝不可看作是对作家粗暴的切段和主观的扣压。鲁迅一直强调的，倘要“论文”，应是顾及“全篇”、“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科学确凿的研究^③，仍是我们的瓶颈。这都启示我们，研究者应以一种整体的、具有内在联系性的眼光审视作家的整体创造，而不能只是关注最被强烈关注的一点；关注其创作流程的产生、生成和流变的前因后果，使作家固守的内在的、整体的写作中心和变动不居的写作走势互证互识、彼此阐释，这样才能不断接近作家创作的真实。

20世纪中国文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走向世界的努力和与世界文学比肩的渴望。不管是在文学创作还是研究中，作为自身之外的“他

① 废名：《说梦》，《语丝》1927年第133期。

② 沈从文：《沈从文年表简编（续）》，转引自糜华菱《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③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者”，世界的文学和文化，是中国的文学工作者重新认识和更新自己的重要参照系，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横向坐标。京派作家的创作中，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同样明显。因而，在京派研究中运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方法，也是必然且自然的事。

京派作家的文学叙事揭示出：倚借传统，京派作家们发现了适合自己的感知方式与审美趣味，表达出他们极具现代性的小说思维。这一点，在废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解放着小说的构造，也试图使小说从虔敬沉重中摆脱出来，并力求引领读者从文本所反映的自由的浮想和精微的思辨中获得乐趣，从各个角度试图逼近小说自身的真理，发现生命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他以“断片”结构小说，看来几无故事，却造就处处生花的邈远意境；他还以自由不羁的眼光重新发现世界，在诙谐和“乱写”之中包含着看似离题的神聊和随笔式的思考，这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特殊审美功用，毫无疑问义本该是小说内在价值的组成部分；另外，即兴随想和联想转换，也让废名的小说充满滑翔衍生的通脱之美。

而沈从文传奇故事式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仿传奇体的极端夸张还是“反传奇”小说对平淡生活中巧而不巧的悲剧的不动声色，都是他在现代理性的观照下，有意识地“利用”或者说顺应了普通民众欣赏故事的阅读传统，使传奇成为包含着神性内涵的小说世界的想象力量，让“所传之奇”不断袒露生存的本质境地，也相辅相成地不断完形其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从而张扬其生命——人性的文学理想。

凌叔华在文学中采用中国画技法中特有的“以大观小”的观照角度，才有了既能入乎其内、又可出乎其外的叙事风度，得以以一种价值并置的对话形态，表达出对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的历史人生更多向的思考。

而汪曾祺的小说则贴近生活、内容丰富、气韵生动，看来切近笔记小说的精义，却又无疑是对当时文学中反映的趋同的生活内容和僵硬的、凌厉的话语方式的反拨；他笔下的百汇万物和日常劳作，有价值也有诗意——谁又能说，京派作家们所思考、关怀的宇宙、历史和

生命等极具人类性、普遍性的文学内容，与表达其思索内容的诗学形式，不是现代的，不具世界性?!

当然，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来说明京派小说的本体结构和意义特征，并不意味着这是本书阐释的唯一向度。现代的思想文化价值和文学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始终是本书说文论人的基本立场。毕竟，无论现代中国曾经多么进退曲折，现代性的追求一直都是现代作家和现代中国人追寻并视为理想的主导价值。即使是京派文学看似充满古典气息的小说创作、节制恰当的传统诗学法度以及重造国民灵魂、改造人心的文学理想，看似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其实质与其说是回归古典，毋宁说这是对新文学发展的持续反思和不断修正，是真正切实地着眼于文学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努力。追根返祖和面向未来，在实践中本来就紧紧纠结、相反相成地推动着文学史的发展。更何况，现代性往往也是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尺度和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也才可能真正做到，在研究当中准确把握京派作家创造出的，具有现代素质的古典精华。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凌叔华：抽象的抒情	(12)
第一节 被压抑的情思	(13)
第二节 独特视角下的对话形态和文本的空间化、共时性 元素	(22)
第三节 逸品之貌	(31)
第四节 现代意识与“出位之思”	(36)
第二章 废名：魏晋的嗣响	(43)
第一节 人的发现	(46)
一 生命之悲的吟咏	(47)
二 生命之芜的袒露	(50)
三 生命意义的追寻	(52)
四 世界图景的拼接	(62)
五 社会历史的反思	(66)
第二节 文的自觉	(69)
一 断片的美学	(70)
二 对非严肃精神的重新发现	(74)
三 联想和想象	(81)
第三节 魏晋风度	(85)
一 清峻	(85)
二 通脱	(87)
第四节 自由精神与言语牢笼	(90)

第三章 沈从文：生命的传奇	(93)
第一节 传奇内涵	(95)
第二节 所传之奇	(99)
一 传奇之奇	(100)
二 传奇不奇	(110)
第三节 传奇之笔	(127)
第四节 生命意识与民族想象	(135)
第四章 汪曾祺：笔记的人生	(138)
第一节 边缘叙事	(139)
第二节 博物风貌	(145)
一 世间百态	(145)
二 人文情怀	(152)
第三节 随事曲折	(164)
第四节 性情之作	(173)
一 寂寞	(174)
二 温暖	(175)
第五节 人道主义与笔记边界	(179)
第五章 萧乾、芦焚：协奏与变奏	(182)
第一节 多而杂的文学影响	(183)
第二节 乡土中国的文学样式	(185)
一 承续传统诗教	(185)
二 择取乡土中国题材	(194)
三 塑造老中国人物形象	(198)
第三节 新的文学走向	(203)
第四节 感时忧世与文学选择	(212)
结论	(217)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4)

导 论

京派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叙事上的自觉与革新。他们身处“非文学”的时代却对构成文本“文学性”的相关诗学因素极为看重并勇于实践，由此文学现代化的命题在京派作家那里有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进。京派作家文学叙事、小说形态研究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具体、科学地说明京派创作价值，精准把握京派作家创作特质。京派作家的创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支柱和重要构成力量，他们文学叙事中显示出的叙事路径的选择及背后对于多重文学和文化的兼容并蓄与创造性转化意义深远。对京派作家的叙事研究构成本文的中心立场和贯穿线索，而这个过程，也是追索京派文学性“如何”形成的诗学之旅。

对于20世纪30年代趋于成熟，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文学特质，也刻意于小说艺术的京派来说，传统文学和文化以及构成其本质的文学传统等应该是京派作家小说叙事的重要研究背景和研究的基本视域。探寻京派文学叙事如何形成其文学性，首先应该对京派作家的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学作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即，应当从题材内容、结构方式和审美风格及与其对应的，作为稳定性深层的审美意识、情志表现方式、艺术思维方式等入手，对京派小说家创作时明显表现出的、对于某一文学传统的偏好，与这种文学传统作细致的比较分析，并由这种比较分析，揭示京派小说之中的古典嗣响所具有的，超出个人的、流派的文学史意义。

科学研究采用的方法和切入的角度，应该适应研究对象。从上述研究角度切入，完全基于一种文学事实，即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不论是在外在形态上还是内在理路上，都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历史